

结构与选择:跨国流动信徒出现的一种维度*

马燕坤

内容提要 跨国流动信徒的出现,并非是社会价值冲突与无序的体现。跨国流动信徒出现是“结构”与“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借助“结构”,跨国流动信徒确立起行为秩序基础,为有序行动的产生找到最初根源。同时,跨国流动信徒还能超越“结构”赋予的“先天性”扩大生存及发展机会,从而实现“选择”。“选择”基于“结构”产生,是对“结构”的实践。“选择”的形式及结果取决于“结构”。“选择”与“结构”如同双螺旋,在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走向上发挥着关联性效用。

关键词 结构 选择 跨国流动信徒 宗教

跨国流动信徒^①的出现及所产生的影响,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崭新的事件。说其古老,是因为自宗教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容出现始,信徒作为流动符号传递信仰的行为便产生(若非如此,就难以解释宗教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普遍事实)。说其崭新,是因为自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普遍事实后,信徒的“跨国”行为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意味(即,国家边界的实体性引发了有关流动信徒宗教信仰行为的跨国性界定问题的讨论)。将当前跨国流动信徒出现的可能形式与原因关联起来,能够发掘出支撑跨国流动信徒行为的“结构”与“选择”机制,并找到解决跨国流动信徒带来的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跨国流动信徒的产生及发展

从理论上来看,跨国流动信徒的出现要早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因此,对跨国流动的起源展开探索研究,需要追溯到更早期,甚至宗教产生时期。作为一种事实,跨国流动信徒的出现,则是较为晚近的事情。跨国流动信徒是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普遍事实后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而在民族国家的建立未成为普遍事实的情况下,信徒行为的跨国性及流动性是不具实质性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及边界的实体化,使得信徒的行为具备跨国性条件。

很长时间以来,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当人们在意识、认知、观念等方面产生某种一致性时,就易达成一致性行动。宗教信徒,尤其是拥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信徒,又格外容易在交往过程中达成一致性行动。共同的宗教信仰能够塑造出信徒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事实及其持续性的历史,能使信

* 本研究是“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名称:跨国流动信徒对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影响;批准号:14BZJ045)”、“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名称:“一带一路”视野下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项目号:15ZDB112)”的成果。同时,本研究获得“云南大学第四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

① 就现实中国而言,跨国流动信徒的存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土的信徒,其价值诉求却与域外的信徒发生着紧密联系,他们会将域外信徒的呼声视为自我的呼声,以致心灵的一致必然造就行为上的一致。也就有了本土信徒走出本地区参与世界信徒的活动(通常地,这般活动的诉求性或反抗性意义极强)的情况。另一种是源自域外的信徒,他们深入本土,以信教为幌子而力图对本土的信徒进行洗脑并使其参与到支持域外以信徒充斥起来的团体运动之中(通常,此种活动的鼓动性或渗透性极强)。

徒拥有一个宗教性的认识,同时还能营造出一个共同体格局。共享同一宗教信仰的信徒,无论他们置身于世界哪个角落,与世界其他角落的信徒爆发出行为共振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一情形一直在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增强。

宗教信徒由于肩负着传播宗教的使命而深入世界各地。然而,进入近现代,信徒传播宗教的行为却具有多重性意义。与历史上的行为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新时期的流动信徒通常会在表面上借助宗教形式,而实质上却饱含着别样的动机或目的。这一情势,在民族国家普遍建立后,彰显出深刻的政治性意蕴,其程度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加深:宗教信徒将其行为延伸至世界各地,并且,同一宗教信徒之间交往的紧密性及整体性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由此,信徒在丰富宗教文化内容的同时,也将世界置入到不确定的风险中。跨国流动信徒的出现,尤其是随着其出现而带出的负面问题的产生,我们不得不抛弃传统的想象,即:只要本国民众或民族不发生动乱就是最安全的。我们应该相信,跨国流动信徒借助“结构”与“选择”的逻辑机制正在制造出一种不安全。

对此,可从“结构”与“选择”关系模式上来获得认识和理解。由信徒内在要素构成的“结构”,对信徒最终“选择”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跨国流动信徒作为一个特定的自我整合性及实践性“共同体”,是在“结构”与“选择”中得以表达出来的。如果没有“结构”培育出的内在认识、情趣及价值观等,信徒的跨国行为就缺乏内在支撑。如果没有“选择”,那么跨国流动信徒就只停留在向内诉求的精神循环上而保持独立单元结构的特点,并不会对外界产生影响。

二、“结构”:跨国流动信徒出现的内因

“结构”是无形的、先验的,是人们意识、认知、理念、情趣、价值观等的结合,是人们“内在要素的有机组合及其组合形式或方式”。^①“结构”具有规范性的价值,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导向性。事实业已表明,任何群体或“共同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建立在……结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其一切如诗如歌的生命活动都不可能,……只能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幽魂”。^②“结构”也会对人们的“思想”有所约束。

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民众,无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他们共同面对某事时,较易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借助信仰,跨国流动信徒能够在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员之间确立起“共同体”之事实。在这一过程中,跨国流动信徒动用了宗教认识、意念、情感及价值观等要素,促使同一信徒之间分享既定的内在结构标准,确立起信徒间的基础性意志。可见,跨国流动信徒之所以出现,宗教信仰明显发挥着重要作用。毕竟,对任何宗教群体而言,“他的信仰决定着他的信念,他的信念产生出他关于生活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观念,他的观念将构成他的意识的源泉,他的意识将引导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会养成他的习惯,而他的习惯便构成他生命的轨迹”。^③由此,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由信仰而模塑出的共同认知能够在保证同一信徒潜在觉悟复苏的同时,也能够使其在感情、目的、希望甚至焦虑、痛苦等方面形成融汇或结合。作为“共同体”的信徒(即,由跨国流动信徒整合起来的本土与异域信徒)一旦被置入此番情形,就会把自己当做一个整体中的一员,从而使得自己与共同体之外的信徒区别开来。

跨国流动信徒,其之所以能够在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员之间塑造出一个整体的形象并以这

①② 陈秉公著:《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0、134页。

③ [英]科林·布朗著,查常平译:《中译本导言》,载《历史与信仰:个人的探询》,上海三联书店,第3页。

一整体性来呈现自我性,显然就是调动内在的信仰“结构”因素的结果。其行为之所以表现出跨国国家边界特性,则是延伸宗教“结构”因素之缘。其间,几个具体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一、单元性。由于跨国流动信徒往往出现在同一宗教信仰人群之中,因而能够营造出特定的人群集合及空间整合格局。二、有机性。跨国流动信徒,其要做的是将与自身有着一致信仰的信众整合为一个整体。在环节上,他们将宗教因素具有的价值调动出来并对信徒的行为进行编码,目的在于使被编码的信徒行为获得有机连贯性。与此,该有机整体“必须排列成它们应予保障的功能性配置,进而把生命与使其得以生存的东西关联起来”。^①三、创生性。尽管跨国流动信徒是借用同一宗教信仰来兑现价值及诉求的,但是,其终极目标则是超越宗教本身所固有的内容,是在实践中不断增进的结果。跨国流动信徒始终能够根据世事或事态的变迁及变化而不断改变、修正及确立符号以表达新的价值及诉求。四、组合性。跨国流动信徒存在将同一信徒组合起来的定力,“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②是主旨关怀。这也是“一种建构艺术。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③这样,诚然能够将“大量混杂……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④

基于“结构”,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产生特定性,同时其外在行为就是内在要素的直接延伸。由此而锻造出的信徒间关系,则处于紧密的关系网络之中,外力则难以破坏信徒内部这番思想及行为的习惯性结合。于此,所导致的结果是,本土与异域的信徒被整合在一起:作为这个整体的每个成员,他们依靠共同信仰联结成内在统一的“结构”性整体。这一“结构”性整体,使得无论是本土信徒,抑或是异域信徒皆能在缩短或劈薄空间的情况下,或者在忽略空间或跨域空间的情况下,而将自身的内心世界与域外信徒的内心世界整合为一体。对于来自域外的信徒,尽管他们与本土的信徒在外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至少存在民族和语言上的差别),但是,他们同样能够将时间打乱,无论是历史上发生的宗教事件,还是现实中发生的与宗教事件有关或关系不大的事件,他们都能够对其进行附会,并将其涂上一定的威严感(比如,伊斯兰教“圣战”的威严),或加上一种为正义而正义的色调(比如,伊斯兰教的为“圣战”而战)。在此,原本以一元性推进的时间进程,在来自异域信徒的跨国宗教行为中却变成一个缺乏秩序的模糊概念。由此,基于“结构”,跨国流动信徒总会力图为其跨国流动行为缔造出一个整体而合乎情理的局面,并在一定的组织性和有序性中提升“结构”的严密性和价值。

另外,跨国流动信徒借用宗教“结构”因素所做的努力会破坏信徒所身处的国家环境。现实中,国家要求公民(包括每个信徒)对国家顺从和忠诚,而信徒却转向对宗教话语的顺从和忠诚,而旨在以超国家、超民族、超宗教的自治运动建立起理想中的自主性王国。无论现实怎样,信徒对宗教信仰的顺从和效忠(或说对宗教“结构”因素之价值的调动和取用)——这个好像是个体创造出的行为模式在新时期越来越得到鼓舞,其并不会因政权或朝代的更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走向覆灭。

三、“选择”:跨国流动信徒出现的外因

在社会化进程中,尤其是当面临外界环境的刺激或压力时,为更好地满足诉求及实现愿望,除调动“结构”框架之作用力外,跨国流动信徒还会借助“选择”机制来塑造其历史。“选择”是指

① 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第104页。

②③④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84、188、193页。

外界环境刺激下,主体结构的构成要素作出相应的反应,发生整合性运作,最终产生指向自身结构的行为选择”。^①“选择”是主体基于意愿的行动表达,是主体应然方面的反映。主体的“选择”是基于自身“结构”发起的,“选择”的结果也极大地服务于“结构”。“选择”是“结构”基础上的“选择”,“选择”的形式及可能的领域取决于“结构”。跨国流动信徒作为一个特殊的身份团体,其“选择”是在“结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选择”,信徒能够超越“结构”赋予的“先天”状态而扩大生存及发展机会。在社会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实践的推进使信徒不断做出更多“选择”。这说明信徒越来越需要在起基础性作用的内部规范与生存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最终使其意志兑现为现实。对于信徒而言,“选择”是具有规则的而非随意。信徒的“选择”是在宗教框架(理念、意志、价值观等)与现实诉求糅合的基础上发起的,其对信徒的意义是明显的。并且,该意义能在信徒之间不断传递(意义可完整地从一个信徒进入到另一个信徒之中),并产生汇聚信徒行动(本质上这是一种由外部靠近而造成的机械性聚合)及规定信徒生活世界发展途径的效果。这可从必然性与可能性两方面来审视。

(一)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总体上看来,现实中的宗教信仰与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俨然存在差异:过去,宗教信仰是一种或近或远、或亲或疏的存在,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社会事实,也是信徒特性的一种标志;而现在,宗教信仰本身已不再是这样一些简约而直观的内容,而成为一种具有变化流动属性、脱离可见性的、包含多重性的意义符号。作为特殊的主体,跨国流动信徒在外界环境的刺激和压力及各类事件的外部催化作用下,其“选择”行为的发生势在必行。结果,跨国流动信徒既创造自身的历史,也创造出其可能拥有的一切身份。随着跨国流动信徒的“选择”在当下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常性的活动出现,这表现在:其对自身的诉求已不再停留在自我论证的神话里,而是在既“行动”又“被动”的逻辑机制中不断体现着自身的存在。

对跨国流动信徒而言,作为“结构”而存在的宗教信仰是提供规范及指导的元素。在此情况下,“结构”所具有的规范及指导性价值显然能够将个体信徒因素的可能性作用及影响程度降到最低,从而预示着群体“选择”的必然性。通过“选择”,能够明确信徒集体向往的目标,并利用有利时机培育出信徒间一致性的举止。在此番行径中,信徒的“‘认同’必须奉‘社会现实’为……圭臬,……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身份是受限的,但对于想象性的认同而言,则不存在此类界限”。^②毕竟,想象性认同是能够在跨越空间(跨越疆域、国家、民族等边界)的情况下发生的。信徒针对现实而做出的跨国流动“选择”,极大意义上就是一种跨越边界情况下的想象性认同的建构,其旨在以更大的群体规模性寻求更大的利益。

跨国流动信徒所做的“选择”,是其生存现实的体现,也是其“迎接挑战,改造外界环境和完善自我的基本方式”,^③更是其表达自主性的一种策略。在“选择”之中,信徒“被号召去真实地对待自己,去寻求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④对信徒自身而言,其“选择”并非是随意的,而是一种对不断变化的最大可能性的捕捉(正确的东西即是那些所谓可能性最大的东西)的结果。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以宗教信仰的话语、符号为出发点,也需要以追求宗教信仰的终极目标为旨趣,同时,他们还会以宗教为表象,借以达到其他目的。“选择”必然地预示着信徒间同一性行为的发生,也预示着信徒内在自我的满足及现实价值的实现。

① 陈秉公著:《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第142页。

② [美]伊丽莎白·格罗兹著,胡继华、何磊译:《时间的旅行——女性主义,自然,权力》,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③ 陈秉公著:《主体人类学原理:“主体人类学”概念提出及知识体系建构》,第140页。

④ [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7页。

(二)可能性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信徒无论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接受的信息已不再是来自于一个单一的渠道。并且,多元信息的获得,已使他们越来越拥有能够发展自己生活形式的机会,越来越能够在实际行动中体现自身的主体性及价值关怀,也越来越能够“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带来了空间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①其“我群意识”从而不断得以突出。加之,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共同关注的问题亦日益成为信徒之间建立联合或协调行动或谋求维护共同利益的强大基础。于是,作为“结构”而存在的信仰文化“对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也提供了创新和变化的重要契机”,^②信徒的行为“选择”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并被一种内在诉求(指信徒本身的)与外在变化(社会环境)共同支配来决定。

当做出“选择”时,跨国流动信徒通过制订计划、规定活动、实施操练等环节营造出一种“秩序”。这样的“秩序”是“各种意愿及智慧……团结合作的结果,而每一种意愿或智慧都以某种使人信服的范式为基础”。^③于是,同一秩序中的信徒,他们“受到引导,甘愿去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④基于此,信徒行为出现多重可能性,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至于当下信徒所做出的“选择”,总体上是围绕着某种信仰抱负而系统展开的,其影响是开放而难以预料的。更多时候,为达到某种影响,他们甚至破坏了同一信徒间友好合作的契约,将自身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公敌。比如,他们在接受某种思想(尤其是极端思想)灌输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的惩罚,最终参与到施加于他们自身的惩罚之中来。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流动信徒正在以真实而具体的行动推演着这一情势,其影响程度及波及范围也正在随着信徒共同体的功能及其各因素的功能的扩展而一并扩展着。

四、“结构”与“选择”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基于“结构”与“选择”,跨国流动信徒具备意识及行为的同质性,确保其生存范围不至于萎缩。基于“结构”与“选择”,跨国流动信徒还锻造出一种生存状态:一个自律的群体活跃在一个不确定的空间里,时时不忘特定压力感下的特殊使命,并受一种坚不可摧的理想主义的怂恿而接受一种风险:即采取措施有针对性的影响或破坏国家建设及发展,最终建立起信徒自身狭隘追求的、能体现绝对自主性的独立王国。由此,通过“结构”与“选择”,松散的原子化的跨国流动信徒最终被改造为有意识的、能聚合,甚至有特殊诉求的群体。

由于共同信念及小集团思维使然,跨国流动信徒在“自私自利”的自我繁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出某种负面性。当跨国流动信徒追求全体一致的努力时,所有成员较易卷入到一种有凝聚力的内群当中。这一特殊的存在状态,极易促使跨国流动信徒爆发出“组织世界”并在其周围设置出一个能够掌握一切权力机制的野心。加之其行为极大程度地被锁定在为争取控制某种权力或获得某种权力的关键资源上而进行的有纪律的暴力的斗争中,这就决定了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最终势必会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及挑战。

在存在形式上,跨国流动信徒是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跨国流动信徒在民间社会形成很多不可见的渠道,他们以小规模的、实际上主动的单位活动,以至于其既无形又难以管理。在行为目标上,他们则试图拖垮具有“乐观主义”情结的政府敌人,寄希望于改变现行的根本政治秩序。

① [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本真性的伦理》,第2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③④ [美]维克多·特纳著,刘珩、石毅译:《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51页。

无论从逻辑上推演,还是基于现实考察,都能得出一个结论,即:相当程度上,“结构”与“选择”已经使得跨国流动信徒对国家治理的威胁具有事实上的可能性,也使得通过暴力破坏现存发展秩序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跨国流动信徒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及挑战,正在通过某种集体的非理性化、动机的非道德性、共识的偏差性,甚至各种宣言、口号的煽动性而逐渐加强。

在具体环节上,跨国流动信徒基于“结构”与“选择”而表现出的行为是精心策划和实施的,他们会精心计算设法摄取权利,也会利用国家管理松散、政治局势混乱、生存现实困难等情况而见风使舵地扩展野心。

鉴于跨国流动信徒对国家治理造成的影响及挑战,设若“以暴制暴”并非就能在根本上化解问题。毕竟,“恶劣的情欲只能用良好的习惯来克服,一种力量只能用另外一种力量来对抗,但后一种力量必须是情感的力量,而不能是暴力”。^①当跨国流动信徒对国家治理造成破坏时,说明其行为已丧失了对自由和生命的尊重情感。而要使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回到正轨,必须重新培育其情感。国家在教育及引领他们的同时,必须从利益入手,并有意地向其证明,其“所丧失的是任意支配自己的财富、荣誉、时间和人身的自由,这样他才会尊重其他人”。^②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会采取适当措施控制跨国流动信徒的行为,在效果上,跨国流动信徒亦会因此野心而有所减退、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暂时的隐退极大地激起更大的反弹,导致其行为及野心的重建、复兴或加剧。事实业已表明,跨国流动信徒并不会放弃以造势、宣传、扩大影响的方式,将暴力放置到人们的意识中,营造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最终以图通过引起人们恐惧的手段夺取胜利。

跨国流动信徒“结构”与“选择”的存在,实际上已直接或潜在地将现有的民主国家治理嵌入到风险生产中或暴力的漩涡中。尽管当今世界,国家借助于严格的组织纪律掌握了庞大的机器,但是,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跨国流动信徒所造就的某种体系的直接或潜在的威胁。

总之,在社会化进程中,跨国流动信徒的出现,并非是一种社会价值冲突与无序的体现。跨国流动信徒的产生及发展是根植于“结构”与“选择”关系机制的结果,其命运是由其“结构”与“选择”共同决定的。借助“结构”,跨国流动信徒确立起行为基础,为有序行动的产生找到根源。基于“结构”,信徒做出“选择”,创造出信徒集体自由的新形势。这一新形势却潜在地影响国家治理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当今世界国家毫无疑问地面临着跨国流动信徒造成的负面影响。当下,要直捣这一问题,同样离不开对“结构”与“选择”机制的挖掘,这样才能达到对问题的根本性整治。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

Abstract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disciple migration is not a reflection of social value conflict or lack of order.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e result of structure and choice. By way of structure, transnational disciples can not only build a basis of social behavioral order, but also find the origin of the patterns of their behavior. At the same time, transnational disciples can surpass certain inborn constraints brought by structure to broaden their existence and increase their development. In doing so, they achieve a right to choose. Choice is 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of structure and is the resulting practice of structure. The form and result of choice depend on structure. Just like a double helix, structure and choice bring relevance to the trend of transnational disciple behavior.

(马燕坤,副研究员,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昆明,650093)

[责任编辑:周旭芳]

①②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第120页。